

AI 生产中的价值辩证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当代审思和理论回应

王 钢

摘 要：AI 技术的革命性发展不仅重塑了劳动方式，更在生产领域引发深刻的辩证效应：一方面，开拓了价值创新的可能空间；另一方面，也衍生了劳动主体消解与价值秩序重构的深层矛盾。AI 深度介入生产流程并参与决策优化的这种辩证特性，致使工业革命时期形成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遭遇双重挑战——人机协作模糊价值创造主体边界，技术迭代催生价值来源多元化认知冲突。在此背景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以“活劳动是价值创造唯一源泉”为理论基础展开了系统性回应：其一，坚守劳动者主体地位，即便智能系统分担脑力劳动，但价值创造的终极动能仍源于人的创造性实践；其二，通过重构“人机”协作的劳动价值阐释方式，强化活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其三，辩证审视资本逻辑与技术理性的互动机制，建立技术伦理与分配正义的双重约束。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人工智能可突破资本增殖的工具局限，转化为解放生产力、优化社会关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战略支点，为实现技术赋能与劳动解放的辩证统一提供制度保障。

关键词：人工智能；智能劳动；价值辩证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

中图分类号：A811.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25)04-0011-09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250613.001

劳动与价值的关系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内核。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1] (P60)}。当前，在智能技术驱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中，人类文明正加速跨入智能化发展新纪元，凸显出系统性创新与结构性变革的双重演进轨迹。作为核心驱动力，人工智能技术已深度融入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领域，不仅重构了传统生产模式与服务形态，更有效促进了社会财富与价值总量的持续增长。然而，这种变化也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核心命题——“活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带来了严峻挑战。一些学者主张，“在弱人工智能时代，劳动价值论已失去适用性，因为价值由弱人工智能的生产活动直接生成”^[2]。另有观点认为，人工智能实现了“工具与劳动者的融合”^[3]，因而应被视为新的劳动者主体。这些看法试图将人工智能技术视为独立于人类劳动的价值创造主体，这实际上构成了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基础逻辑的理论颠覆。

因此，有必要重申并论证：人工智能本质上属于机器的范畴，其功能遵循马克思的经典论断——“机器本身不创造价值，仅通过服务将自身价值转移至产品之中”^{[4] (P444)}。立足人工智能技术的根本属性，揭示智能时代价值生产的生成逻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重新考察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学说的实践指向，构成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需要持续探索的关键课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与中国生态文明制度创新研究”（18BKS074）

作者简介：王钢，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wg20230606@163.com（湖北 武汉 430070）

一、AI时代的劳动重塑

人工智能作为第四次变革的核心引擎，正通过与资本有机构成的深度融合，实现生产流通全链条的智能升级以及重组着人机协作的社会组织形态。而这一进程在AI技术革命驱动下深刻改变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实践方式，重塑着物质资料再生产过程的时空结构，同时为价值创造与转化带来了全新的模式和路径。

（一）AI对劳动方式的改造

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使机器具备了类人化智能特性，更在替代人类脑力劳动领域展现出显著优势。具体而言，这一技术革新正通过三重路径重塑劳动图景。首先，诸多传统认知中专属人类的智力型岗位正经历系统性替代。如超市自助结账系统全面取代人工收银岗位，智能客服机器人实现全天候无缝服务响应，而搜索引擎的高效运算更使得人工信息检索逐渐边缘化。其次，AI技术同时催生出AI训练师、数据标注员、算法工程师等新兴职业群体，这些岗位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持续优化智能系统的认知边界与决策能力，推动技术要素深度嵌入生产流程的各个环节。再次，AI还促成了人与智能机器协同工作的新模式，在智能化工厂中，工人与机器人共同完成复杂的生产任务。以上情形，虽然对于什么是“劳动”、“劳动”是不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劳动”是否仅仅是属人的物质性活动、“非物质劳动”^{[5] (P108)}是不是现代劳动的典型形态等，学术界一直聚讼不断，但这种劳动方式的划时代变革标志着生产组织形式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

（二）活劳动与物化劳动关系的复杂化

AI技术重塑了传统的劳动方式，促使人的活劳动与物化劳动二者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在马克思剖析的机械化大生产阶段，直接劳动投入与劳动对象化的物质形态之间呈现出泾渭分明的结构性差异。物化劳动作为过去劳动的凝结形态，始终以机器、原材料等生产资料的静态形式存在，成为生产过程的物质前提。当生产完成后，在资本主义生产链条中，活劳动成果分别转化为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消费资料与推动资本增殖的生产资料，构成生产与消费的辩证运动。正如马克思指出：“劳动产品是劳动对象化的结果，即劳动固定于某个物质对象之中。”^{[6] (P156-157)}这一论断揭示了劳动成果的物质载体属性，深刻映射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逻辑——活劳动作为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其动态实践过程被物化劳动所遮蔽，由此形成劳动主体与劳动成果的异化关系，以及资本积累与劳动者生存境遇的结构性矛盾。

然而，在资本有机构成革命性变革中，固定资本的智能化发展正以历史性力量重构价值创造的物质基础，使物化劳动逐渐成为支配性的生产要素，这一进程深刻动摇了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界限关系，AI的出现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当前，人-智能机系统正在多个领域颠覆劳动参与模式，从机械臂焊接车身与工程师监控数据流并优化算法共存，到电商平台算法与商家运营共同创造收益，皆展现出物化劳动与活劳动关系的耦合性。而随着AI技术从弱人工智能向强人工智能的演进，其能够承担的任务日益复杂和多样化，这实质上拓宽了物化劳动的功能边界。这一生产过程使得活劳动与物化劳动的功能出现重叠，物化劳动在生产中的比重显著提升，活劳动的角色逐渐转向系统设计、维护和监督等环节，关系复杂度显著增加。

（三）劳动时间与空间的扩展

AI技术的广泛应用让劳动时间具备弹性的同时也扩展了劳动空间。从时间维度来看，新型劳动方式的出现形成了劳动时间的弹性化延伸机制。机器对劳动时间的重塑具有历史延续性，早在机器大工业时代，马克思就揭示出机器具有“将工作日扩展超出自然极限的强有力工具”^{[6] (P146)}的本质特征。如今，AI技术凭借其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特性，将这种时间拓展机制推向新高度，远

程办公软件与智能设备的普及使劳动者能够突破物理空间限制随时处理工作任务，原本碎片化的非工作时间被系统整合进劳动过程。这种技术赋能表面上便利，实则使工作与休闲的界限持续消融。AI技术的产业链特征显著延长了劳动的总体时长，从算法架构设计、模型迭代训练到实际应用调试，AI的生产链条较传统工业延伸出多个新环节，大量活劳动从直接生产领域转向数据标注、系统优化和伦理调试等上游环节。这种劳动时间的延迟效应使得活劳动与最终产出的时空关联被技术黑箱遮蔽，进而产生“劳动消逝论”的技术迷思。究其本质，“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都成为数字资本的控制对象，构成数字资本主义时间剥削的多元形态”^[7]。

从空间维度来看，劳动场所的边界呈现出持续扩展态势。传统工厂的物理边界正在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分散的办公室与虚拟协作空间。在此生产方式下，劳动过程呈现出“去场所化”特征，如建筑设计师通过VR实现跨国设计协作。这种空间重构改变了劳动的存在形态，推动了“无人化劳动”的表象生成，当无人驾驶系统执行配送任务时，智能设备独立运作的系统都传递着劳动场所消失的错觉。这种技术表象背后看似去无人化，其实存在着劳动空间转移现象，因而空间延展并非消除人类劳动的存在，而是通过技术遮蔽效应将核心劳动环节转移至更隐蔽的虚拟空间。

二、AI生产中的价值辩证法

AI重塑劳动格局的进程中，其社会效应呈现出辩证张力。在释放人力束缚、提升生产效率、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加剧了劳动者被边缘化的风险。

（一）AI驱动生产中的价值革新

AI在生产过程中是否能够创造价值，是当前学术界热议的焦点问题。为此，我们可以从劳动目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及其AI的特性展开分析，以探究AI在价值生成中的作用。

第一，从劳动目的看，AI产业化催生的“智能劳动”以明确目标为导向，通过技术创新释放出超常效率。这种劳动形态之所以突破传统，关键在于其依托算法系统，能够在瞬间完成海量数据分析与决策生成。这种看似自主的创造性过程，实质上仍运行于人类预设的技术框架内，从数据标注到模型训练，每个环节都凝结着开发者的价值判断。因此，智能劳动的高效性仍是人类目的性的技术延伸，而非脱离劳动主体的独立价值创造，更无法超越劳动对象化的现实物质基础。

从劳动对象来看，虽然“智能劳动”仍作用于物质自然界，与传统劳动并无根本不同，但AI技术的介入显著拓宽了劳动对象的范围，并创造了新的技术路径。例如新能源技术和新型合成材料的开发，正是AI在数据分析和模拟实验中的应用成果。通过智能算法快速筛选最优方案，原本需要反复试错的传统流程被精准预测取代，使新型材料的研发周期缩短了数十倍。这些新领域的开拓表明，AI并未改变劳动对象的本质，而是通过技术手段深化和扩展了其边界，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为人类探索未知领域打开了更多可能性。

从劳动资料的角度看，马克思指出，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身与劳动对象之间，用以传导活动的物质载体或综合体”^{[1] (P431)}。在此定义下，AI设备尽管具备模拟人类思维的能力，其本质仍属于劳动工具的范畴。AI系统看似复杂的运算能力，实则依托芯片、电缆和能源等物质基础实现。无论AI引入了智能化运算还是自主决策功能，这些特性最终都“归于劳动资料的物质属性，而非劳动主体”^{[8] (P209)}，它的“思考”始终受限于物理设备的运行规则。

第二，“智能劳动”价值创造的特性。“智能劳动”在价值创造过程中展现出与传统劳动不同的独特特征，相较于传统劳动，它不仅让机器能够自动调整工作节奏，还能根据实时数据修正操作误差。AI在制造业中的应用显著提高了生产精度和效率，让劳动者从操作者转型为监督者，将精力用于优化人机协作模式，最终形成螺旋上升的价值创造循环。

一是在无人化工厂体系中，价值创造首先表现为智能系统与人类劳动的深度耦合。以特斯拉超级工厂为例，六轴机器人精准执行精密装配，通过实时数据回传自动修正操作偏差，而人类工程师则依据动态反馈优化参数设置，专注算法迭代与系统调优，这种协作范式将劳动分工重构为“机械执行层”与“智能决策层”的双元架构，前者保障基础操作的零误差运转，后者持续挖掘生产流程的改进空间，这种人机协同制对劳动者的专业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是AI的引入改变了生产中的资本结构。不变资本（如智能设备）的投入成本上升，而可变资本（如人工工资）的占比下降。这种转变促使企业重新平衡投入比例，前期大量资金用于购置智能设备和软件系统，但后续运营中人力相关支出持续减少。如自动化产线采购及运维成本激增，而劳动力规模缩减带来可变资本压缩，这种资本形态的迭代升级，使企业能够通过技术维护替代传统人力管理，在双重作用推动下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剩余价值率。

三是尽管“智能劳动”被纳入复杂劳动范畴，其价值创造效能显著高于简单劳动，但仍需基础性劳动的底层架构支撑。日常维护人员仍要确保设备稳定运行，技术人员持续监控系统健康状况，这些看似常规的作业保障了智能系统的持续进化。以AI模型训练为例，数据清洗、特征标注等标准化操作构成算法优化的基石，而工程师则专注于参数调优与模型迭代。两类劳动在时间维度上形成递进关系，基础操作积累量变，智能劳动催化质变。

（二）AI生产中的价值困境

人工智能融入生产领域，在提升价值创造效率的同时，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核心命题形成了双重挑战：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呈现弱化趋势及其价值生成逻辑发生技术性位移。

第一，劳动主体的消解。AI在物质生产中逐步取代人类劳动的趋势已不可阻挡，这一现象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核心假设，以人类劳动为基础的价值创造构成了根本性挑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论述手工劳动与机器生产的本质差异。他指出，机器由动力装置、传动系统和工具部件构成，其运作逻辑彻底颠覆了传统生产方式“机器通过多个工具的协同作业，替代了仅依赖单一工具的个体工人”^{[1] (P431)}。在手工时代，工具是人类肢体的延伸，劳动者完全掌控生产过程；而在机器时代，机器本身的结构成为生产的核心，人类劳动退化为辅助角色，主要负责监督和校正。而弱人工智能的出现将这一转变推向新高度，因为它具备自主收集信息、进行简单决策并与外界交互的能力，其工作效率远超以往任何时代。就像富士康的“无人工厂”实现了从零件组装到质量检测的全流程自动化，人类劳动者的参与被降至最低。这一发展轨迹清晰地展现了物质生产从手工劳动、机器生产向AI主导的生产模式演进的必然性。AI介入人类生产动摇了劳动者主体的地位，劳动价值论在新生产模式下的适用性也受到了质疑。

第二，人工智能时代推动价值变迁。具体而言，AI推动了资本有机构成的提升、单位商品价值量的下降以及价值实现方式的转型。一是资本有机构成提升。马克思将生产过程中技术组合与价值结构的动态关联定义为“资本有机组成”。随着AI技术的广泛应用，生产过程中自动化设备和智能系统的投入显著增加，而劳动力的需求则相对减少，从而导致资本有机构成持续提高，以汽车制造业为例，自动化生产线的引入大幅减少了每单位产出所需的工人数量。智能技术的资本化应用引发了资本技术构成的革命性跃升，导致可变资本份额的持续递减，这直接表现为劳动者工资性收入的相对贫困化。传统产业部门劳动者由于与智能生产体系的技术性脱节，不仅陷入结构性失业困境，更催生出数字资本时代的过剩人口储备。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力商品的市场估值既遭遇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双重消解，又在资本主义价值规律支配下呈现出系统性贬值趋势。

二是单位商品价值量下降。在马克思看来，商品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AI通过提升劳动生产率显著缩短了生产单位商品所需的时间，从而降低了其价值量。就像3D打印技术的应用将定制化产品的生产周期从数周压缩至数小时，尽管产品的使用价值未变，其价值量因劳动投入

减少而大幅下降。这一趋势表明，从价值形态的当代嬗变审视，智能革命重构了商品二重性的辩证关系，使用价值的指数级增殖与交换价值的系统性坍塌形成历史性倒置。这种技术异化现象的本质在于，智能技术的普遍化应用正在消解人类劳动在价值形成中的本体论地位，进而导致商品拜物教在数字资本主义阶段呈现出新的矛盾形态，当劳动对象化过程愈益被算法体系作为中介，传统劳动价值论的质的规定性与量的可通约性皆面临范式危机。

三是价值实现方式的转型。马克思强调：“商品交换使商品彼此作为价值发生关系并作为价值来实现。”^{[6] (P104)} 然而AI技术的渗透彻底革新了这一过程。具体来说，传统商品交易依赖实体市场，交易成本高且效率有限。而AI驱动的数字平台，如电商网站和智能物流系统，通过算法精准匹配供需并优化配送流程，实现了“虚拟化”交易。“数字平台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可以逐步塑造‘不在场’的交易场景，还能以算法推荐的方式精准匹配供需，为买卖双方节省时间和精力，缩短了交易周期，使交易更加透明化。”^[9] 与此同时，区块链支付基础设施的纵深渗透推动货币介质脱实向虚，通过突破实体介质的物理约束，驱动价值符号化的非线性传导进程。

AI在生产中展现的辩证特性，促使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正面临智能生产带来的现实挑战：其一，人机协同的深度交融使得价值创造的主体边界逐渐模糊，动摇了传统理论中“活劳动”作为唯一价值源泉的绝对性；其二，数据要素的指数级增殖、智能算法的非线性演化以及非物质劳动的隐性渗透，使得价值生成机制突破了单纯劳动时间的线性框架，呈现出技术赋能下多要素协同的动态复合性。这一双重张力暴露了劳动价值论在解释智能技术介入生产时的理论局限，成为当下亟待审思的时代问题。

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AI生产中的当代审思

人-机协作的智能化时代，智能机器在诸多场景中发挥的作用已显现出“超越人类”的迹象，当智能机器以远超人力的速度和效率推动价值创造时，劳动者是否仍能维系其价值创造的主体地位？这对“劳动者是劳动主体与价值源泉”的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来说，似乎提出了挑战。

（一）价值创造主体身份的模糊

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正在模糊人类与智能系统之间的传统界限。过去，人类通过思维能力、工具制造能力和社会属性确立自身在世界中的独特地位，认为这些特质是人区别于万物的核心标志，“但随着机器思维、机器人制造机器人以及人形智能机器人开始像人一样进入社会生产生活领域，人与智能系统、智能机器人之间的区分就开始变得模糊了”^[10]。可以预见，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下，智能系统和机器人在认知能力、决策效率等方面将实现质的飞跃，其表现很可能超越人类劳动者的平均水平。在实际生产和服务场景中，部分智能机器人的工作效率持续提升，其操作精准度和任务完成质量已接近甚至优于人类员工水平，与普通劳动者也越来越难以区分。工厂流水线上，工业机器人以毫米级精度完成加工后，质检环节可能由人类与视觉检测系统共同把关；电话客服中心里，语音合成系统与人工座席的无缝切换常让用户难以察觉。这种“人机难辨”现象存在于人机协同的生产领域，迫使社会重新思考如何定义人类在智能时代的独特价值。

在智能经济模式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生产与服务领域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使劳动形态呈现出显著的高科技特征。人类与智能系统、智能机之间已经形成实质性的“劳动竞争”关系，围绕“合格劳动者”和“劳动模范”的认定标准展开激烈角逐。这种竞争不仅体现在生产效率层面，更延伸至创新能力、学习速度等维度，形成了人机协同又相互博弈的新型劳动关系。面对日新月异的智能化劳动场景，以及日益精密复杂、快速迭代的机器系统，即便是高素质的知识工作者也常感力不从心，需要持续更新知识体系才能保持竞争力。而“数字弱势群体”则陷入更

深的适应困境，他们面临着技能断层、就业机会萎缩等多重挑战。这些群体往往只能被动旁观智能设备高效运转，看着它们昼夜不息地创造丰富多样的产品和服务，产出巨大的经济社会价值，却难以参与其中，且逐渐难以理解这种新型劳动模式。当智能化重新定义了劳动本质时，若人们一边享受着智能系统的劳动成果，一边否认其“劳动者”的合法地位，这种矛盾态度既缺乏逻辑支撑，又违背了基本的公平原则。

（二）价值生成来源的挑战

根据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经典理论，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是工人的“活劳动”，劳动时间越长，创造价值越大；劳动投入减少，价值理应同步缩减。然而现实图景却与此对比鲜明，全球产业链中智能系统大规模替代人工，制造业车间日益呈现“无人化”运转，服务业中AI客服、智能导购等数字劳动力占比持续攀升。这些“活劳动不在场”的生产现场，不仅没有导致价值缩水，反而伴随着企业利润的持续增长与社会财富的加速积累。这种矛盾在数据层面尤为显著，经合组织国家平均周工作时长较20年前减少12%，制造业就业人口占比下降至15%以下，但全球GDP总量却翻番。在智能仓储、算法交易、自动驾驶等典型场景中，人类直接劳动投入已降至近乎零的状态，但其创造的单位时间价值产出却是传统劳动模式的数百倍。当手术机器人完成精密操作、量化交易系统创造超额收益时，这些价值显然无法用操作者的“活劳动”时长来解释。这种“劳动投入递减，价值产出递增”的反向运动，本质上揭示了智能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化，即数据要素的指数级增值、算法模型的自我优化、智能系统的持续学习能力，正在重构价值创造的底层逻辑。如何解释无人工厂创造巨额利润、算法程序产生超额收益等现象，已成为检验传统劳动价值理论当代解释力的关键命题。

有观点认为，智能系统和机器人的价值创造完全依赖于其背后的研发团队，甚至直接将AI的产出归功于人类开发者，这种观点既缺乏说服力，又与现实认知矛盾。以清华大学“九歌”AI诗歌系统为例，它基于海量诗歌数据训练，其创作质量和效率已超越普通诗人，甚至能日产出整本诗集的体量。若将这些作品全部视为开发团队或使用者的“创作”，显然难以获得广泛认同。这些现象表明，虽然当前法律尚未明确界定AI生成内容的权属问题，但社会已逐渐形成共识，不能简单地将智能系统的产出等同于技术团队的劳动成果。AI的创造性工作具有相对独立性，其价值不能完全归属于开发者或使用者的任何一方。事实上，AI系统通过深度学习形成的创作能力已具备某种程度的自主性，其产出既非简单复制训练数据，也非完全受控于开发者指令。就像画家使用颜料创作，但画作价值不能简单归功于颜料制造商一样，AI的价值创造过程需要被理解为“人机协同”的新范式。在这种范式下，人类提供初始框架和训练数据，而AI系统则通过算法演化产生超出预期的创新成果，二者共同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价值创造体系。

若传统理论坚称机器人的劳动不创造价值，为何现实中它们能自主生产商品、提供服务，这些成果既被消费又产生利润，却被排除在价值计算之外？在智能技术深度渗透的当下，劳动者身份界定的模糊性与价值来源的争议性，关系到人类在生产关系中的核心坐标，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因此，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需要结合当代实践做出时代回应。

四、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对AI生产辩证作用的理论回应

深入剖析了AI生产中劳动主体身份模糊与价值生成难题等挑战，揭示了智能技术对传统劳动价值论的冲击。面对这些挑战，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保持其理论活力和实践指导价值，成为亟待回应的问题。因此，从活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理论的角度出发，探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如何适应AI生产的辩证作用，为智能时代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一）坚持劳动者的主体地位

在人工智能引发的劳动价值本体论重构中，争论的焦点集中于数字资本增殖逻辑下活劳动的替代限度与非物质劳动场域中劳动者的历史主体性问题。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通过揭示劳动二重性在算法霸权中的辩证呈现，确证了劳动者作为价值源泉的本体论依据，并以“人的解放”为价值旨归，因此这一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是调和AI与劳动者关系的理论基石。从唯物史观看，技术进步的最终目的应服务于人类，而非凌驾其上。正如习近平指出：“发展人工智能，将为我国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为民生改善提供重要保障。”^{[11] (P140)}

首先，需强化劳动者的主体作用。从劳动过程理论看，技术创新依赖于人的创造性劳动，AI的开发与应用离不开劳动者的智力投入，这要求从技能培训、权益保障到决策参与层面重构劳动价值体系。所以，理论上应突出劳动者在技术变革中的主导地位，通过制度设计确保劳动者在技术应用中的话语权，完善知识成果转化的利益分配机制，并通过推动劳动者向创新型领域流动，使其成为技术进步的推动者而非被动接受者，最终构建劳动者与技术协同发展的长效机制。其次，“技术是实现人的目的的一种手段”^{[12] (P26)}，需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AI解放了体力劳动的束缚，凭借其超越人类生理极限的体能优势，它们不仅能高效完成常规体力劳动，更可在高危环境中替代人工操作，胜任重复性机械作业。智能技术在解放人类体力劳动的同时，还从事着一些更高价值的工作。例如，它们已能完成产品讲解、法律咨询等基础服务，承担教学辅助、医疗影像分析等专业任务，甚至参与文艺创作等需要创造力的领域。并且依托智能技术构建的系统（如信用评估平台、智能安防系统），正在替代人类完成工作质量评估、风险监控等管理职能，这些原本需要人类判断力的监督权、决策权，正通过数据算法实现自动化运作。从拓展人的本质限度来看，这是劳动效率的提升，更是人的自由发展的契机。重构劳动价值论应围绕人为目标核心，着重探索如何通过教育和职业转型，全面提升劳动者的技术能力与社会参与度。

（二）坚持活劳动价值一元论

“当前参与价值创造的生产要素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技术、数据等非物质形态的生产要素在生产劳动中的重要作用不断凸显。”^[13] 不可否认，AI技术推动了无人化生产的可能性，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环节的顺利运转仍离不开人类的活劳动。这一事实表明，AI并未使“价值”成为过时的概念，而是强化了活劳动作为价值源泉的地位。从生产要素的演变看，技术、数据等非物质要素在现代生产中日益重要，而这些要素的生成无不源于人类有意识的劳动活动。

立足上述论断，首先，需重新确认劳动的不可替代性。AI并非否定劳动，而是推动劳动形态的转型升级，低技术含量的重复性劳动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高技术、高价值的复杂劳动。这种变革呼唤理论对“劳动生产力”的再定义，强调技术进步如何通过活劳动实现质的飞跃，特别是在人机共生场景中，劳动者的元问题拆解能力、技术伦理判断力和动态系统认知力正成为价值创造的核心维度；劳动价值论需拓展到“人类智能资本”的积累与转化层面，既要量化脑力劳动的认知密度，也要重构组织形态以适应分布式协作网络和虚实融合的生产环境。其次，需深化活劳动概念的内涵。AI时代催生了数字劳动等新形式，传统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界限被打破，从历史唯物主义看，活劳动的多样化反映了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理论需从现实生产条件出发，剖析数字劳动的本质，需构建数字劳动二重性分析框架，既要关注数据要素的商品属性，更要揭示算法权力背后的劳动异化新形态，通过将认知盈余、人机交互复杂度等参数纳入劳动计量体系，丰富活劳动的范畴，以增强劳动价值论的解释力。再次，在肯定活劳动作为价值生成根本来源的基础上，需辩证整合智能系统与智能机器在价值创造的动态过程中所发挥的媒介效能，这不仅能拓展活劳动创造价值的具体形式，还能为人机协同中的价值争议提供解释框架，从而证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智能时代的理论生命力。

(三) 辩证认识资本与AI技术的互动

“资本逻辑是统摄资本世界的基本原则与行为规范,资本首先具有增殖自身的牟利逻辑”^[14],AI与资本的结合形成了一种双向驱动关系,资本为AI技术的发展提供资金与动力,AI则为资本的扩张注入新的动能,然而,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这一关系存在偏离服务社会的初衷。从剩余价值理论看,AI可能被资本用作强化剥削、追求垄断和利润最大化的工具,导致劳资矛盾的加剧。这种双重性启示我们,需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指导,辩证把握资本与AI的互动,遏制其负面效应,确保技术向善发展。为此,习近平强调:“要整合多学科力量,加强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社会问题研究,建立健全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伦理道德。”^{[15] (P790)}

在此从劳动权视角出发,智能社会的制度设计需聚焦两大核心任务:一是通过技术治理实现劳动解放,二是构建公平可持续的劳动分配体系。针对技术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关键在于建立抑制资本无序扩张与技术异化结合的调控机制,通过重构社会分工模式与治理框架,系统性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保障全体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的基础上,推动人类向创造性劳动阶段跃迁。具体实施路径包含三个层面。首先,确立人本导向的技术发展原则。在推进智能机器人研发应用时,优先替代高危重复性劳动岗位,将劳动者从异化劳动中解放。随着生产服务的智能化升级,对标准化程度高、程式化特征明显的劳动领域,应建立自动化替代的梯度推进机制,使人类逐步转向需要情感交互、创新思维的高价值劳动领域,让劳动回归马克思倡导的“生活第一需要”本质。其次,构建智能化分工协调机制。政府部门需建立实时劳动市场监测系统,通过数据分析精准识别智能设备难以替代的创意设计、情感护理、战略决策等岗位,同步开发数字经济催生的新型职业。在劳动分配环节,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平台经济”^[16],建立基于劳动者技能特长与岗位需求的智能匹配平台,重点关注弱势群体的就业保障,确保劳动机会的公平获取。最后,完善技术伦理监管框架。通过立法明确人机协作中的权责边界,建立人工智能劳动替代的负面清单制度,在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守住人类劳动的价值底线,为人机协同创造良性发展空间。

通过对AI生产中劳动方式与价值创造的深入剖析,不难发现,尽管人工智能在重塑生产流程、提升生产效率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其本质仍是人类活劳动对象化的产物,无法替代活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核心地位。面对AI带来的劳动主体模糊化、价值来源多元化等挑战,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以其“活劳动是价值创造唯一源泉”的核心理念,为我们提供了审视和回应这些挑战的理论基础。在肯定技术进步的同时也要警惕技术被资本捆绑,因为从人的本体论来看,只有当技术的进步摆脱资本逻辑的束缚,才可能真正助力劳动者从异化劳动中解脱,从而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让劳动者不会成为无所事事、丧失能力的“全新而庞大的无用阶级”^{[17] (P293)}。因此,坚守劳动者主体地位,不仅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坚持,更是对技术进步带来社会变革的理性回应。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胡斌,何云峰.弱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价值论与劳动制度[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9(4).
- [3] 黄欣荣,张魏欣.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的解放[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
- [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 [5] Hardt, M., A. Negri.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M].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4.
- [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 [7] 聂嘉琪. 数字资本主义的时间剥削及其政治经济学批判[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2).
- [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资本论(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9] 李楠. 人工智能时代劳动价值论再审视[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4(3).
- [10] 孙伟平. 智能系统的自主活动是否创造价值?[J]. 思想理论教育, 2025(4).
- [1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 [12] [美] 布莱恩·阿瑟. 技术的本质[M]. 曹东溟, 王健,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
- [13] 王水兴. 人工智能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审思[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1(5).
- [14] 付文军, 张楚媛. 资本逻辑的理论意涵及其批判张力——基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文本考辨[J]. 东南学术, 2023(5).
- [15]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防范风险挑战应对突发事件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 [16] 于天宇, 王帅帅. 资本逻辑批判与生命逻辑建构——乔尔·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生命政治意蕴[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1).
- [17] [以色列] 赫拉利. 未来简史: 从智人到智神[M]. 林俊宏,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

Dialectics of Value in AI Production: Contemporary Reflections and Theoretical Responses to Marx's Labor Theory of Value

WANG Gang

Abstract: The r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of AI technology has not only reshaped the way of working, but also triggered profound dialectical effects in the field of production: first, it has opened up the possible space for value innovation; second, it has given rise to the deep-seated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dissolution of the labor subject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value order. The dialectical nature of AI's deep integration into the production process and its role in decision-making optimization presents a dual challenge to Marx's labor theory of value which was formulated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obscures the delineation of value-creation subjects, while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engenders cognitive dissonance concerning the diversification of value sources. Against this backdrop, Marx's labor theory of value,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that "living labor is the sole source of value creation", has made a systematic response: First, it adheres to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the laborer. Even if intelligent systems undertake mental labor, the ultimate driving force of value creation still stems from human creative practice. Second, by reconstructing the labor value interpretation method of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the role of living labor in value creation is strengthened. Third,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capital logic and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is dialectically examined, and the dual constraints of technological ethics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is established.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n break through the tool limitations of capital appreciation and be transformed into a strategic fulcrum for liberating productive forces, optimizing social relations, and promoting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providing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for achieving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labor liberation.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elligent labor; dialectics of value; Marx's theory of labor value

(责任编辑 孙洁)